

《唐虞之道》的民本思想

邓建鹏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邓建鹏(1976-),男,江西宁都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研究。

内容提要 学界对《唐虞之道》的思想主旨及思想归属存在不同见解。笔者从楚简文本出发,认为《唐虞之道》阐述了儒家民本思想,集中体现了利天下而弗利及仁义兼施;结合传世有关文献判定《唐虞之道》作者当为子思。孟子在子思“民贵”、“君轻”思想趋势基础上,将民本思想发挥到极致。

关键词 唐虞之道 爱亲尊贤 民本思想 子思

中图分类号 B 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1999)05-0045-04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出土一批竹简,其中一篇经整理定名为《唐虞之道》^①。关于《唐虞之道》的思想主旨及其思想归属问题,学界存在不同见解^②。笔者认为该简文赞扬尧舜禅让,实质上较集中地反映出作者的民本思想,这对判别《唐虞之道》的作者、所属学派及所处时代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就其所反映的思想及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禅让与利天下而弗利

《唐虞之道》的作者距尧舜之举所处时代不甚悬远,其记忆中留下的先民之“天下为公”模糊痕迹与民本思想主旨相通。先秦许多学者借对禅让制的歌颂来表达其民本思想主张。《唐虞之道》开首便是“唐虞之道,禅而不传”。禅与传(即世袭)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制度。《礼记·礼运》有这样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为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是为小康。”

尧舜处于原始社会,普遍流行的观念是天下为人民共有,天子之职以禅让的方式传于与己并无血缘关系的人,在后人看来这是大公无私的表现。进入文明社会后,社会上盛行“家天下”观念,天下为私家所有,“传”取代禅让,天子之职世袭。故而,《唐虞之道》开宗明义地指出禅让是“利天下而弗利也”。以禅让利天下之民,而非为自己谋私利。接着,简文认为

“利天下而弗利”是“仁之至也”。仁源于爱人,简文将“利天下”同爱人民相统一,把利纳入仁的内容。此与孔子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③仁、利二分相异。为适应形势需要,战国民本思想出现新的发展,民本思想倡导者直接提出“利”的命题,并将之和仁统一,扩充仁的思想内涵,以争取民支持,更富于人民性。

其次,《唐虞之道》以“尊贤故禅”为禅让制的重要内容,这是利天下的保证。“尊贤故禅”意味着将天子之职禅让给贤者。只有贤人方可有效统治、管理天下,秉公无私,不过分注重个人私利,保证“利天下而弗利也”。

再次,简文指出禅让另一内容是天子年老应让贤。鉴于天子到了高龄无法正常有效地管理国家,《唐虞之道》提出天子“退而养其生”。按照人正常生理过程,“古者圣人二十而冒,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听明衰”,天子年老体衰,逐渐失去治国能力。要“利天下”,持续保证利民宗旨,天子应激流勇退,“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对甘于禅位的天子而言,“此以知其弗利也”。

《唐虞之道》作者以设定禅让的三个内容:禅而不传、尊贤故禅、退养其生来保证“利天下而弗利”。其赞扬“尧舜之王”“仁之至也”的全部出发点在于利民之主旨。先秦民本思想家从君民对立关系中看到

民对君的制约作用,提出“政以治民”、“政以正民”,通过考虑民的利益、为民着想来达到治民安邦的目的。《唐虞之道》阐述的禅让制充分体现这一思想。故而,作者从反面推导出“尊贤故禅”的重要性,“圣者不在上,天下必坏,治之,至养不肖;乱之,至灭贤。”国家无圣贤之人治理,则天下混乱,人民遭殃。

(二)仁义兼施与对民的教化

《唐虞之道》力主仁、义兼施。“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方,爱天下之民。……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简文以“爱亲”为仁,“尊贤”为义,倡导“爱亲尊贤”,仁义并举,缺一不可,从而“爱天下之民”。这显然是儒家理想化的尧舜禅让思想。孔子强调敬亲长上,孝于父母,即“爱亲”。战国一开始就是群雄竞争的时代,致胜关键在于人才的竞争,谁能唯才是举,谁就有可能王天下。现实使得儒家将“尊贤”提升到与“爱亲”同等的地位。《唐虞之道》以孝导源于“爱亲”,“爱亲”是对与已有血缘关系之人的爱。由亲爱亲族扩充到以“爱天下之民”为孝,又以“爱亲”同仁对应起来,“爱亲故孝”,“孝,仁之冕也。”所谓孝,即在于仁,仁亦是爱天下之民。

《唐虞之道》以“尊贤”同“爱亲”并论,倡导仁义兼施,从民本角度着眼,选拔为民尽职的贤人。“舜其人也。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足民养□□□。”尧舜之时,洪水泛滥,野兽威胁人类,五谷不熟,“尊贤”能够选拔有才干者,禹、益、后稷各尽其才,身体力行,率民与自然灾害抗争,保证农业丰收,使民维持生存,这是尊贤的巨大效果。先秦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对民的教化,以收上下和辑、稳固君民关系之鹄的。针对民“覆舟”力量的现实压力,《唐虞之道》详细列出化民的各个方面:

夫圣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亲也;时事山川,教民有敬也;亲事祖庙,教民孝也;大教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先圣与后圣考,后而退先,教民大顺之道也。

化民之道包括:教民尊上、亲下、敬山川神祇、孝敬父母和教民悌与大顺之道;令民明晓敬上亲下、进退礼让之节,达到君民和谐,国家安宁。这一思想教化,是民本思想中处理君民关系的重要措施。

在贯彻思想教化的方式上,《唐虞之道》重视爱心、礼乐,反对用刑罚和武力强制民众接受思想教化。“礼畏守乐孙民教也。咎繇皋陶五刑,出弋兵革,罪涇桡(?)□□……用威,夏用戈,正不服也。爱而正

之,虞夏之治也。”《唐虞之道》认为用兵、刑暴力迫使民接受教化会适得其反——“正(政)不服也”。相反,以爱心、礼乐方式向民温和地灌输教化,循循引导,方可达到“虞夏之治”的理想境界。《唐虞之道》倡导“尊贤故禅”,尊贤标准是超乎大众之上的至高德行,“禅而授贤,上德之谓也。”天子之位要禅让给圣贤,进而,对圣贤(即未来的天子)的道德修养提出很高的要求。“禅而授贤”的条件是有德者方有资格身登天子之职,治理天下。“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嗜。”个人修身是走向政治道路的前提条件。《唐虞之道》以舜为例,指出个人德行修养包括的内容:

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闻舜弟,知其能嗣天下之长也;闻舜慈乎弟□□□□□为民主也。故其为兮窆子也,甚孝;及其为尧臣也,甚忠……尧之禅乎舜也,如此也。

只有孝,才能“养天下之老”;只有悌,才能“嗣天下之民”;只有“慈乎弟”,才能为“民主”;只有孝于父,才能为忠臣。个人修德,才能推己及人,达于四海。此一致思路径,反映了儒家的鲜明特色。圣人德行达到至高境界,就不会因为自身处境变化而变化,“方在下位,不以匹夫为轻;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重。有天下弗能益,亡天下弗能损。”修到这种德行自然不易,但只有达到这种层次,才能“知命”、“居草茅而不忧”、“身为天子而不骄”,对下民保持一如既往的爱护,始终以民为邦之本。

(三)《唐虞之道》的思想归属

《唐虞之道》由“利天下”展开论述,通过禅让达到利民宗旨,最后的归结点落到民上,初步体现了“民贵”思想趋势。探索这一思想归属,对研究先秦民本思想发展脉络有重要意义。《唐虞之道》崇仁、孝,重修身,推己及人,与儒家基本思想特征一致,毫无疑问此文出自儒家学派。笔者据《唐虞之道》主旨思想结合有关出土文本、传世文献作一分析探讨。

首先,《唐虞之道》提倡“尊贤故禅”、“利天下而弗利”,反映了作者重才举贤、秉公无私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倾向。这在郭店楚简另一篇简文《五行》中亦有所体现:“君子知而举之,谓之尊贤。”意即“尊贤故禅”。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与楚简《五行》不同处在于其除经外尚有传,传对经作阐释,从中可进一步看出《唐虞之道》与《五行》思想的相似之处。帛书《五行》:

君子□举之,谓之尊贤。君子知而举之也者,犹尧之举舜。□□之举伊尹也。举之

也者,诚举之也。知而弗举,未可谓尊贤。

文中以“尧之举舜”为“尊贤”,即《唐虞之道》的尊贤禅位之意。这一尊贤思想亦反映在战国早期子思思想中:

鲁穆公问子思曰:“吾闻庞桐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观民……”^①

子思主张“尊贤”“举善”,与《唐虞之道》相关阐述一致。《五行》出自子思,为学界基本公认,可否据此推断《唐虞之道》亦出自子思,必作进一步论证。《唐虞之道》多次言及“利天下而弗利”。郭店楚简中,明确标明含有子思思想的是《鲁穆公问子思》。文中子思公开提出“恒称其君之恶”为“忠臣”。君之恶莫大于不施仁义、暴虐人民,其后果将直接导致国家败亡。子思的忠臣观目的是制约君主滥用权力,对民无疑有利。成孙弋认为子思是“为义而远爵禄”。这种与个人私利(爵禄)相对的“义”,同《唐虞之道》“利天下而弗利”之思想暗合。子思这一忠臣观体现了权势与道义的二元分化,在权势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从义不从势,表达了子思“君轻”的思想趋势。

子思传世之作有《礼记》中的《中庸》、《表記》、《坊记》、《缙衣》四篇^②。《唐虞之道》的爱民、无私思想在这些著作中可窥一斑。《表記》:子言之曰:“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惓惓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子思盛赞舜“子民如父母,有惓惓之爱”、“亲而尊”,与《唐虞之道》“爱天下之民”、“爱亲尊贤”意同,“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反映到《唐虞之道》,便是“此以知其弗利也”。《唐虞之道》以“利天下而弗利”为“仁之至”,仁实含利民内容,子思亦有同样的言论。

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③

与孟子“何必曰利”不同,子思将仁义同利(即利民)统一起来:仁义本来就是为了利民。最大的不利是上不施仁义,至“下不得其所”而“为乱”,此同于《唐虞之道》利民思想。民本思想在子思其它著作中屡屡出现。郭店楚简《缙衣》有: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故心以

体法,君以民亡。”《礼记·缙衣》“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与楚简《缙衣》大同小异。《缙衣》由民对君的制约及君对民的依赖关系出发,强调了民的重要性,为其民本思想提供理论依据。

其次,《唐虞之道》倡导“爱亲尊贤”、仁义兼施,注重个人修身。在子思著作中皆可找到相关阐述。楚简《五行》有:

戚则亲,亲则爱,爱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仁。

不亲不爱,不爱则不仁。

其实就是《唐虞之道》的“爱亲为仁”。关于定“尊贤”为义,楚简《五行》有“其等尊贤,义也。”另,帛书《五行》有:

贵贵而后尊贤,义也。贵贵者贵众贵也,贤贤、长长、亲亲、爵爵、选贤者无私焉。其等尊贤,义也。尊贤者,言等贤者,言选贤者,言足诸上位。此非其以其贵也,以其义也,贵贵而不尊贤,未可谓义也。

帛书《五行》定尊贤为义,贵贵、尊贤并立,赞“选贤者”为无私之举,体现出爱亲为仁、尊贤为义的仁义兼施思想。关于仁、义的阐释,《中庸》有:“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④此同《唐虞之道》之“爱亲”为“仁”,“尊贤”为“义”毫无二致。《表記》亦有:“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与《唐虞之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如出一辙。显然,这一“爱亲尊贤”、仁义兼施思想为子思主张。

在道德修养方面,《唐虞之道》赞扬舜在不同处境依然保持高尚德行而“不忧”、“不骄”,重修身,“正其身,然后正世”,修身是走向政治道路的前提。同样,《中庸》将修身列为平治天下国家的九经之首。

最后,由时间上而论,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器物特征判断,郭店1号楚墓墓主大致下葬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则《唐虞之道》竹简抄写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末,即下葬前。据钱穆氏《先秦诸子系年》考释,子思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范围内,其著作成文不晚于公元前5世纪末,若由门人著述,成文亦不迟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故而,《唐虞之道》成文年代及竹简抄写年代不冲突。

综上所述,可断定《唐虞之道》当出自子思。

(四) 结 语

《唐虞之道》歌颂禅让,并非要社会回到远古先

王时代,而是赞扬尧舜关心民瘼,为民操劳,进而希望国君以尧舜为楷模,爱亲尊贤,仁义兼施,赢得民的支持,此为《唐虞之道》民本思想主旨所在。战国时封建地主阶级兴起,子思借效法先王之名,行新兴阶级政治之实,给新兴阶级政治披上先王的神圣外衣,“六帝兴于古,咸由此也。”使之权威化、合理化,期冀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与推行。子思继承孔子仁、义学说,并在新形势下充实进新的内容。就《唐虞之道》所反映的主旨思想而言,其对“受业于子思门人”^②的孟子直接产生了巨大影响。子思推崇尧舜,《孟子》一书尧二十四见,舜四十见。孟子将尧舜之治描绘成民本思想达到的理想境界。子思的民本思想已具有“民贵”、“君轻”趋势。在此基础上,孟子更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得乎丘民为天子”^③和仁政学说,形成了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把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推向高峰,标志着民本思想的成熟。由此观之,儒家思想在从孔子到孟子的发展演变中,子思思想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本文承蒙导师罗运环先生指点,特致谢意。)

注 释:

① 见《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参见李学勤、廖名春、姜广辉、李存山、陈明等先生的文

章,均收录于《中国哲学》第20辑《郭店楚简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③ 《论语·子罕》

④ 《韩非子·难三》

⑤ 《隋书·音乐志》引梁人沈约说:“《礼记·中庸》、《表記》、《坊记》、《缙衣》皆取自《子思子》。”另可参蒋伯潜《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7页。

⑥ 《孔丛子·杂训》。另据钱穆氏《先秦诸子系年》,则子思卒于公元前402年,孟子生于公元前390年,两人不可能相对答,疑后人附会子思思想于此。

⑦ 按:有学者认为此引文出自“子曰”,将之归属孔子之言。说见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收录于《中国哲学》第二十辑。子思托名孔子造作语录已为荀子所记: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荀子·非十二子》)孔子在时,子思尚幼,其所记孔子言论只能是日后传自他人而加以发挥。另,龙晦认为在“贵贵”与“尊贤”问题上,孔子是著名的“贵贵”派。详见魏启鹏《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版,序一第3页。以孔子崇“亲亲贵贵”,则此引文之“亲亲”“尊贤”并举当出自子思本人,这与子思在《中庸》里将“尊贤”、“亲亲”同列“凡为天下国家九经”吻合。

⑧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⑨ 《孟子·尽心下》

(责任编辑 严 真)

On the Concept of the People's Fundamental Importance in *TangYuZhiDao*(唐虞之道)

Deng Jianp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uthor: Deng Jianpeng (1976-), male, Graduate student,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a's ancient academic culture.

Abstract: The confusion regarding the main thought and the creator of *TangYuZhiDao*(唐虞之道) triggered various conjecture from some scholars. This essay, however, holds that *TangYuZhiDao*(唐虞之道) actually deals with one part of Confucian ideology, characterized by the thought that people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element in the state. Such opinion is embodied especially by the two sayings of *TangYuZhiDao*(唐虞之道)——“Instead of being selfish, governors should leave all the people under heaven beneficial” and “Showing benevolence to relatives and respecting the persons of wisdom and abi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ncerned proof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angYuZhiDao*(唐虞之道) originates from *Tzu-ssu*(子思), the grandson of Confucius. In addition, such thought was developed to the greatest point by Mencius later on.

Keywords: *TangYuZhiDao*(唐虞之道); loving relatives & respecting worthy persons; concept of the people's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zu-ssu*(子思)